侗族居家社区养老模式探究^{*}

□徐赣丽

〔摘要〕 侗族村寨保存着诸多尊老敬老的良风美俗,在此社会风俗影响下,侗寨老人根据血缘和地缘关系聚集在各自的鼓楼等公共空间进行社会交往和休闲娱乐活动,发挥热心公益和爱好文艺的余热,从而较好地满足了他们的精神和情感需求。从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和老有所用三个方面分析了侗族老人居家社区养老生活幸福指数高的表现和原因,为当代社会普遍面临的养老问题提供借鉴。

〔关键词〕 侗族;尊老习俗;居家社区养老;幸福指数

〔中图分类号〕 C9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8179(2014)01-0048-07

Analysis on Aged Care Relying On Home and Community in Dong Village

XU Gan-li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1,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a rich variety of Dong's custom of respecting elders and the unique of aged-care model relying on home and community. Further more, it analyzes the performance and cause of high happiness index among the aged in Dong peoples. The paper aim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elder-care issues which are generally faced with in contemporary society.

Key Words: Dong peoples; Custom of respecting elders; aged care relying on home and community; Happiness index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养老的问题变得越来越严峻,也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关注。但是,目前大多数的研究和政策都是从养老保障制度出发,似乎这是解决养老问题的主要路径。然而,目前社会保障制度在中国实施起来仍有难度,尤其是在幅员广阔的农村,这种高成本的养老几乎做不到。另一方面,当前的养老过分关注的是老人的物质生活,即老有所养;至于精神生活的满足,仅停留于伦理角度的家庭和社会关怀,以及必要的娱乐设施,并无具体的从老人生活方便角度出发满足老有所乐,老有所为的方法。从养老关涉的范围来看,多半注重家庭内部的孝顺的要求,忽略整个社会尊重

老人的风尚,也无视老人的社会交往需要。养老不仅是物质供给上的满足,还有多种其他需要。对于大多数老人来说,经济供养和生活照料基本能够得到解决,而精神慰藉却是大问题。一些地方的老年人精神生活单调,常常面临孤独和空虚,精神生活状况令人担忧。调查发现,老年人的养老生活方式较为单一,缺乏更多的精神文化活动,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老年人精神生活较为寂寞空虚苦闷(胡倍,2010)。

本文以作者的田野调查经验为依据,参照相关文献,以少数民族中社区文化保护较好的侗族为例,针对当前中国养老现象中出现的问题,讨论低成本,高福利的养老模式,期望能为城市社区的养老和乡村养老问题提供一些借鉴。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民族文化的村寨依托与保护研究”(项目编号:12BMZ063);广西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新疆和谐民族研究团队”资助。

二、侗族社会的尊老习俗

侗族有着尊敬爱护老年人的民族传统,世代相承至今。这种传统美德意识和情感在礼俗称呼、饮食起居、议事娱乐、生产劳动、赡养丧葬等方面都有表现。

侗族敬老的表现之一是称呼上体现长幼之分。按照侗族的习惯,年轻人对老年人的称呼,无论家境贫富,社会地位高低,一般都不直呼其名,往往以其长子或长孙之名放在前面做限定语,后面加上亲属称谓。如某人名吴国光,他的儿子叫吴大年,孙子叫吴小华,那么别人称呼他,就逐渐改为“大年爸”和“小华爷”。对待女性也是类似。^①

侗族老人做寿也体现了他们的尊老观念。对世代聚族而居、家族观念强烈的侗族人来说,在日常生活中,为老人做寿可以看做是集中对家中老人表达敬意的方式之一,是个人生命周期中除丧葬以外最为重要的事件。侗族人认为60岁为“寿”的开端,能够活到60岁就是长寿有福之人。从60岁开始,再过12年,即“一轮”,也就是72岁时为“中寿”;再过一轮,老人到了84岁时,被称为“大寿”。从寿、中寿到大寿,老人随着时间所实际累积而成社会性权威,人生的价值随着年纪的增大而增加。侗族人从获得生命到成为集体承认的“社会人”,再经由寿、中寿到大寿,越是久远获得村寨和民族历史的知识越多,也越具备权威的资本。

侗族尊老习俗除了表现在日常生活中照料老人,还体现在节日里特别厚待老人。侗族有“请老人”的风俗。每年冬天过侗年期间,家家户户都会去“请老人”,儿子请父母,孙子请爷爷奶奶,女婿请岳父岳母,外孙请外公外婆,可说是争先恐后。老人到后,小辈们便杀鸡杀鸭,甚至宰猪宰羊,做成美味佳肴招待老人。开席时,先请老人入上座,其余的人再入桌就座。席间,大人小孩不断向老人敬酒、夹菜,让老人吃饱喝足。侗年期间,谁家请来的老人多,对老人照顾得好,即受到大家敬重(刘柯,1989)。除了逢年过节,在老人过生日时,年轻人也会给老人送干柴或糯米粑、酸鱼、鲜菜之类礼品,有的还帮老人补衣裤、洗被子或翻瓦补漏,表示敬爱之情。^②时至今日,虽然许多习俗已经发生变化,但在九月九重阳节仍组织寨上老人集体会餐,探望需要帮助的老人。

侗族居家、社交均讲究长幼规矩;在侗寨,每个人从小就被教导对待长辈要礼貌。年轻人早晨起床后,第一次见到老人要问候,出外见到长者要先打招呼。新谷成熟,年轻人要把第一碗新米饭恭恭敬敬地双手端给老年人尝新;家有鱼肉好菜和好酒好饭,或各户办“红白喜事”,要先照顾老年人,给他们先

尝。地方上有重大兴革事宜、喜庆丰收,过民族传统佳节举行集体性议事、娱乐的场合,大家总是安排老年人坐首席,并先请老年人讲本民族历史掌故或唱历史古歌。年轻人在鼓楼、石板坪、风雨桥、风雨亭等公共场所歇息聊天,见老年人来都不约而同地主动让座。新建鼓楼、石板坪、风雨桥等公共建筑竣工之日,众人照例恭请热心公益和长于建筑的德高望重的老年人剪彩。有事必须经过老年人面前,要先道声“欠礼”。年轻人在窄险小道与老年人相遇,要立即退让路边,请老年人先通行;遇老年人过桥不便,会搀扶老人过桥;路上见老年人挑担或扛柴吃力,多出手相帮。^③

在有些侗族地区,由于尊老风俗的深远影响,甚至会考虑老人的情感需要,为异性老年间的交往提供方便。在贵州黎平县黄岗乡有一特殊的风俗,即老年人举行“行歌坐月”。逢天晴气爽的日子,儿女们往往给长辈们做好午饭,特意安排他们去与自己年轻时的恋人进行老年间的“行歌坐月”。这种在外人看来荒唐的行为,在黄岗却被认为是符合伦常的,这一做法被整个社区的人们所接受,不会受到其他人的歧视或冷嘲热讽。老人在“行歌坐月”中,谈叙往事,互相交流、相互倾诉,缓解自己内心的惆怅,表达自己对对方的真实感情,同时,也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诉说,分享对子女未来的诸多想法,也在分享各自的快乐与忧愁(邹芸筠,2012)。老年人仍然有着浪漫的情怀,这种情感是对年轻时候爱的回味,也是对现实中人生遗憾的一种弥补。从这可以看出侗族社会对老人的宽容爱戴程度,其养老真正做到了精神满足。

侗族尊老的传统还表现在他们对养老习俗的培养和规范上。侗族是爱歌的民族,他们常用民歌民谣来进行传统美德教育。他们自编民歌赞颂祖先开创祖业、造福后代,表彰那些尊老爱老的年轻人。广西龙胜侗乡迄今还流行《敬老歌》:“小孩靠父母抚养,懂事明理老人教。尊老爱老养老众人夸,夸你聪明好心肠……”通过向小孩传授这些民歌,从小培养他们尊老爱老的传统美德意识。侗族社会的舆论力量对敬老美德的形成也起着重要的作用。^④如果后生不孝顺父母,虐待打骂老人,不听劝告,多被众人鄙视、讥讽;有的歌师还把他们的不孝行为编成《贱老歌》等,不时当众传诵;使得亲戚朋友远近村民都对其疏远,孤立,直到其改恶从善。总之,在侗族社会,年轻人是敬老、爱老、养老,还是厌老、贱老、虐老,成

^① ^② ^③ ^④陈维刚:《侗族尊敬爱护老人的美德》,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研究所编《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四辑),1981年。

为他们衡量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优劣的尺度。

侗族传统社会还用约法款的形式来维护敬老的传统美德。款约中大都有提倡尊敬爱护老年人, 处置虐待打骂老人的规定。例如, 中华民国初年广西三江侗乡高弄、鹿归、具盘、具河寨等地的款约就谈及: “厌老贱老, 打骂老人, 蛇狼心肠, 房族要管, ‘侗理’ 要罚……” 并且规定了处罚方法。^① 因此, 通过家庭教育的熏陶和社会舆论的谴责、“侗理” 的制裁, 使侗族的尊老习俗世代相承下来。

上述可知, 侗族社会普遍有尊老习俗, 家庭敬老、社会爱老, 并有社会舆论和乡规民约监督限制和严厉约束, 老年人的社会地位高。社会对老年人价值的正确评价和认识直接影响老年人的精神生活。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大环境下, 形成了侗寨老人独具特色的养老模式。

三、侗寨老人养老模式特点 与其幸福指数分析

养老模式大体可分为家庭养老、社会养老、自我养老三种, 又有人分为集中养老和分散养老。侗寨的居家社区养老模式是适应特殊的民族文化传统和自身的经济发展水平而形成的, 不是纯粹的某种模式, 而是兼具了几种养老模式的特点, 从而使其养老功能和文化内涵互为补充、互为包容, 较好地满足了侗族社会老人的需要。养老一般包括经济供养、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三个最基本的方面, 与一般的养老模式相比, 侗族的特色在于除了家庭养老或自我养老外, 会集中到村寨社区的某些固定场所一起做伴和娱乐, 更好地满足了老人的精神需要和社会交往的需要, 使老人不仅老有所养, 也能老有所乐和老有所为。侗寨老人的社区养老生活不同于城市的养老机构, 与城镇单位的老人活动中心有区别, 与目前城市刚刚试行的居家社区养老模式也不相同,^② 显示出其积极主动、高效节约、自在随性的特点。

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提出“需求层次理论”, 将需求从低到高分生理的、安全的、情感和归属的、尊重的、自我实现的(马斯洛, 1987)。下文对应马斯洛所说的五种需求, 把生理和安全的需求视为“老有所养”, 情感和归属的需求概括为“老有所乐”, 而尊重和自我实现的要求则可以概括为“老有所为”, 从这三个方面对侗寨老人的养老生活及其幸福指数进行分析。

(一) 老有所养: 家庭与房族的自觉赡养

侗族养老一般从五十多岁开始, 儿女成家并有了孙辈就可以慢慢转入养老的人生阶段。侗寨的老人觉得老年意味着从生产的主线上退下来, 把生活

的重担转移给儿孙辈, 自己则有更多的空闲时间休息, 受到家庭的孝敬和社会的尊重, 能经常自由出入鼓楼等公共场所与老人一起做伴、一起聊天和看电视、玩纸牌等。侗族的家庭是父系制的, 有几个儿子的家庭分家时, 一般都留足父母的养老田, 父母亲通常跟小儿子一起居住; 招赘户和承继户则长辈与儿孙辈一起共同生活。母亲, 也就是女性老人通常会帮着儿媳妇看孩子, 做家务; 男性老人则简单的干点农活, 多半不管家事。春节期间笔者去到侗寨调查, 发现家中处于老者的父亲总是在休息状态, 而外出打工回来的儿子一直在忙着为家里过春节做准备, 并觉得这是理所应当的。据笔者在侗寨的观察, 几乎每家每户的老人都已经不再承担家庭的重担, 而以休闲为主, 问到他们的生活来源时, 多半表示他们大部分日常消费都是自产的, 无需向外购买。相比于城市, 侗寨老人的生活成本低廉, 日常的消费都是自己或儿女们生产的农产品, 或儿女外出打工寄钱回来购买, 因此, 对于大部分有后代的老人老有所养几乎没有问题。

生活照料是养老的重要内容之一。从日常生活来看, 老人的日常活动以闲暇为主, 在侗寨, 绝大多数老人的主要时间在休闲中度过, 虽然部分老人要料理家务和从事种田种地等农活, 但已不是生产劳动的主力。当代大部分的家庭主要男劳力都外出打工, 老人日常生活由自己照顾, 儿媳和女儿也会帮忙。侗族是聚族而居, 同一村寨村民多是同房族或存在亲缘关系, 因此, 如果家人都不在身边, 生病护理也会有亲友和邻居相帮, 其日常生活基本没有困难。

侗族村寨是一个互助共济的小社会, 奉行“同声相应, 同气相求, 相友相助, 互相扶持”,^③ 对无依无靠不能上山下田劳动、衣食无着的孤寡老人极为关怀照顾, 有田地的交房族成员轮流代耕; 若是无田地, 又丧失劳动力的, 有房族归房族赡养, 无房族由全寨居民乐捐钱粮赡养; 并安排他(她)们做些力所能及的公益事, 如有的帮看守鼓楼、风雨桥, 扫地抹凳, 烧水泡茶; 或敲锣喊寨防火; 或为村寨修洗泉水井。在侗乡, 若某地出现鳏寡老人因丧失劳动能力, 以致田园荒芜, 饥寒交迫而走寨串巷乞讨时, 大家认为是侗家人的耻辱。而这些老年人所在的房族、寨

^① 陈维刚:《侗族尊敬爱护老人的美德》, 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研究所编《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四辑), 1981年。

^② 一些地方的居家社区养老模式还得不到认可, 主要以家政公司提供基本的家政服务为主, 服务的质量不高。这种形式自然与侗寨的居家社区养老是不同概念的。

^③ (民国)姜玉笙:《三江县志(卷十)“附编·乡约”》, 1975年。

子就被别的房族和临近村寨斥责自私吝啬和缺德无能。^① 因此,受到社会舆论的影响和监督,以及前文所说的民间习惯法的约束,侗寨老人几乎都能老有所养。

(二)老有所乐:鼓楼里的集体休闲娱乐

通常我们关注的养老多半都是指在家庭内部或养老机构里,享受儿女的照顾和生活上衣食无忧的待遇。但其实,除了部分不能自理的老人外,目前对大多数老人来说,他们最需要的已经不是物质生活上的需求和照料。因为即使家庭富足,老年人由于身体能力的衰竭也消费不了很多物质;而随着生活重心的转移,老人的闲暇时间和个人独处时间增多而不知如何打发和排遣;另外,生命的单一发展方向使老年人普遍怀有对未来的恐慌。老人渐趋衰落的生机时刻提醒自己,每个人潜意识中都有着恐惧和担心。出于以上原因,老人常容易被失落、孤独、无助、焦虑等情绪所笼罩。因此,在满足物质需求的基础上,老人对精神需求更为迫切。老有所乐主要指情感交流的需要和归属的需要,在日益城市化和老龄化的社会,纯粹家庭养老已经很难满足这种需要,一些人寄希望于机构养老,因为在那里,老人的交流对象扩大了,老人们在一起有许多共同语言可以交流、沟通,他们会互相帮助、互相劝慰、互相鼓励、互相交流生活经验等。从这点看,侗寨鼓楼等公共场所同样具备类似功能。

侗族人喜欢群聚而居,特别是同一房族的人,都密集地围拢住在一起,鼓楼是同一房族的人或是居住在同一片区的人乐捐修建的,是大家议事和娱乐的地方,为村寨里的公共场所,每个人都可以去,既可随时去,也可随时离开,没有任何约束。现在青壮年大多外出打工去了,鼓楼就成了老人聚会的地方,大多数老人都会经常光临鼓楼,鼓楼因此被称为“老人馆”。鼓楼对于侗寨的老人有多种意义:

1. 跟同龄人交往的场所。社会交往是人的基本需要,人到老年,社会活动减少,生活内容单一,老人会特别害怕孤独。前人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老人都渴望交流,频繁、广泛、良好的社会交往可以调节失衡心理,促进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提高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并改善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国家统计局湘潭调查队课题组,2012)。与其他地区不同,在侗族村寨,老人常去鼓楼等公共场所消磨时光,在那里做伴聊天、看电视、玩耍等。除了农忙或家里有事,几乎每天必去,不去好像觉得生活中缺少了什么。笔者曾多次询问他们为什么这么喜欢去鼓楼,老人们表述那儿人多好玩、开心、可以讲笑话、聊天,可以交流信息,知晓寨上最新发生的事情。确实,鼓楼里老人们在一起聊天,由于年龄相近,习性相同,彼此兴趣

相投,生活环境和经历大体一致,从小生产生活常在一起,因此,共同话语很多,心灵也容易沟通,极容易形成共鸣。值得一提的是,我们在侗寨调查发现,侗族老人在鼓楼里经常互相开玩笑以取乐,他们对于这种玩笑是不计较的,因此来说是安全的;同时也是对日常单调生活的调剂,对老年常面临的疾病和害怕将死的苦痛的逃避和情感宣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侗寨的鼓楼等公共场所及相关的交往休闲活动成为了老人情感依赖的场所和途径,使他们老有所乐。

2. 娱乐活动场所。休闲娱乐活动对于老人的身心健康非常有益。如果娱乐设施缺失,闲暇活动单一,社会交往贫乏,那么就会带来相应问题。但是,在许多地区,老人的日常消费大部分都集中于医疗消费和饮食消费等基本生活消费上,没有多余的经济收入出入娱乐场所,并且社区也较少专为老年人提供娱乐场所。侗寨的经济状况虽然并不太好,但是侗族村寨依凭血缘和地缘的群聚生活,本村寨集体及周边人乐捐修建了作为公共场所的鼓楼、风雨桥等,这为老人的安身去处提供了方便,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出入。因此,在侗寨公共娱乐休闲场所和设施并不缺乏,老人每天去参与各种娱乐等活动根本不需要多少经济支撑。

侗寨老人时常在鼓楼等地进行唱侗歌、吹芦笙和棋牌游戏等活动自得其乐。侗族是传统的爱歌民族,他们平时除了干农活和做家务,空闲时间就聚在一起唱歌自娱,把以前所见所闻和所感编成歌做纪念。许多侗寨都有多耶队、芦笙队、文艺队、琵琶歌和情歌队等民间团体,队员大部分是50~70岁之间的老人。据不完全统计,我们调查所到的十多个侗寨60岁以上的老人都喜欢听侗歌看侗戏,多于看电视节目,且有超过70%会唱侗歌、多耶或吹芦笙。老人们经常聚在一起学唱和习唱各种侗歌,特别是老年妇女经常在晚饭后,待小孩子睡觉了就齐聚在一起唱多耶,男人们则更多是在鼓楼坪集体吹芦笙。每逢节庆日或临近村寨建新鼓楼新戏楼等,寨上的芦笙队、歌队就外出去集体做客,或者邀请外村的歌队芦笙队来自己寨一起欢庆。老人们在这些活动中都是主角,从组织到表演等都是他们自己。当问到他们为什么热衷这些唱歌、吹芦笙等活动时,他们总是笑着回答说“开心啊”。确实,他们这样乐此不疲,因为这些活动本身给他们带来了许多的欢乐和满足。

^① 陈维刚:《侗族尊敬爱护老人的美德》,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研究所编《广西民族研究参考资料》(第四辑),1981年。

鼓楼是侗寨老人集体养老的当然场所。冬天大家齐聚在鼓楼,围坐火塘烤火,每个人轮流带柴火在那里取暖,这已经形成了传统;夏天,鼓楼楼上是通风纳凉的好地方,有时候人少,老人们会头枕着短木墩,躺倒在长凳上睡觉。鼓楼不仅是老人聚在一起聊天,唱歌,讲笑话的地方;年轻人还为老年人捐资买了电视机和影碟机,可以让老人集中一起看侗戏,看新闻,评论时事。鼓楼为老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一个共享的社会文化空间,鼓楼里老人的精神生活丰富多彩,可以排除老人的孤独感,使他们获得交流的愉悦和心里安全感。

(三)老有所为:社会公益事业的主力

老有所为指的是获得家庭和社会的尊重,实现老人的自我价值。老有所为是老人延续生命价值和活力的一个重要方面。随着老人从人生的旺盛期退下来,身体体能下降,做许多事情都无能为力了;加上老年人普遍具有一个心理,就是觉得自己老了,思想和知识也跟不上时代了,在家里和社会变得可有可无,无事可做,巨大的心理落差困扰老人们的心,因此,产生自卑消极的心理。而在侗寨社会,侗族有“大树护村,老人管寨”的谚语,人们通常认为老年人是开发建设家乡的先辈,在人生几十年的历史中,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生产技术和经验,又通晓做人处世道理和待人接物的礼仪,熟悉本民族特别是本支系本村寨历史掌故、风土人情、民俗事象和历史文化,因此被视为是生产生活的师长和智者,村寨大事都要征求老人的意见。尽管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老人都已不再年富力强,基本不再是生产的主力,不具有实际的政治影响或权力;但侗族村寨的“老人协会”仍发挥很大的作用。传统侗族社会,寨老组织具有权威的作用,侗寨寨老、款首等村寨头人,都是有才干、威信高的老年人,由他们组成领导村民款众的集团;今日,实行村党委和行政管理制,似乎老人的作用已经被取代,实际上,侗寨昔日的寨老组织已经演变为“老人协会”,寨老们仍然充当一定的管理角色,协助村两委管理村寨事务。“老人协会”是村寨民间组织,主要任务是维护本地生产生活秩序和习俗,调解村寨内外的各种纠纷;制订乡规民约,安排全寨的生产生活,主要是为村寨的公共事务服务,如鼓楼、路桥等公共设施和电、柴火的供应,喊寨提醒村民注意防火安全和水池清理,也负责道路和河道等公共空间卫生和秩序的维护、乐捐、月也和文艺表演的训练和安排,以及在村寨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等民俗活动中做出具体的指导,抚慰人心。总之,他们是各种矛盾的化解者、社会公益事业的主要承担者和社会活动的主要组织者,有事时聚集商议,不计报酬,义务工作,无任何特殊权利,且办事公正(欧潮

泉、姜大谦,2002)。因此,老人协会在众多的为民服务过程中获得了村民的信任与尊重,老人们的精神生活得到了充实,心理和情感获得了满足(张爱华,2010)。老人在表述中,总以老人对村寨的贡献为自豪,每次问到老人们在鼓楼主要讨论些什么话题,他们就会认真地回答说“说得最多的就是公益事业了”。其中,做贡献最多的是寨老们,由于他们的奉献精神 and 办事的经验获得了社会的赞扬,赢得了年轻人的尊敬和信赖,使年轻人愿意服从老人的安排来参与集体的大事,这也给老人带来成就感,使得老人更加积极地投入到社区公益事业中去,促进和维护了社区的和谐与稳定。冯雪峰指出,老人协会丰富多彩的活动和在村寨的影响力,使老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新回到村寨生活中心来,这不仅使老年人对生活产生良好感觉,而且给中青年农民对生活未来的预期产生深远影响(冯雪峰,2006)。老人的意见得到贯彻和尊重,老人作用得到体现,从而使老年人较少产生自卑、孤独、悲观等消极心理,并带来成就感和幸福感。

老有所为还体现在,许多传统文化如民间神话传说故事、民歌、传统手工艺、讲款等传承至今仅有老人还掌握着。只有老年人知道本民族迁徙、繁衍的历史和地方重大事件、民族英雄、能工巧匠及其事迹等,这些内容对于村寨和民族是一笔财富,他们的讲述和传授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做出了贡献,把它记录整理,使之不致失传,也体现了老人的价值。当前国家推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侗族多项“非遗”传承人都是老人,他们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普遍关注和重视,同时也在为民族传统文化的传承尽心尽力。

在传统社会,侗族老人以养老休闲为主,女性老人在日常生活中把家务琐事转移到年轻媳妇身上后,她们有更多的空闲时间,是村寨里生诞寿宴、婚丧嫁娶和庆贺新居等场合中重要的参与者。而男性老年人的劳动负担由年轻一代接替,他们成为传统知识的持有者和家庭权威。当今社会,随着村寨大部分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所有的人情和生活中的大事件都由老人操办帮助料理家务;老人还负责帮着照看孙辈,除了农忙季节由儿女回来帮忙或请人帮忙,其余时候简单的农活也由老人负责。因此,他们仍是生活中的主要角色,仍在做贡献,并不被视为家庭和社会的包袱。

社会上对老人的尊重也使老人获得价值感。前人研究表明,社会正确评价和认识老年人的社会价值,形成尊老、敬老的社会风气,有助于提高老年人精神生活的质量,使老年人生活幸福感加强(《人口研究》编辑部,1998)。侗族不同辈分之间代沟不明

显,老人对晚辈仍然具有教养、教化、知识传授的权威性,子女不仅从言行上尊敬父母,甚至从心理上还会对之产生深深的崇敬感。在社会上,通晓侗族文化知识的歌师尤其受到重视和敬重。每次赛歌,不管胜负,歌师都被主寨奉为上宾,受到热情款待。赛歌结束后,还派人挑着礼品送歌师回家(杨通山、蒙光朝、过伟,1983:292)。

上文对侗族老人的幸福生活指数从三个方面做了分析,这三个方面不是界限分明的,需要的层次也不完全是梯级的。老有所养是基础,老有所乐和老有所为二者常常交叉在一起,因为有所为就会有所乐。侗寨的养老模式体现了对老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满足,因此,可以说侗族老人的居家社区养老生活是幸福的。

四、侗族居家养老模式的可借鉴性

从前文我们可以大概了解侗寨老人居家社区养老的幸福生活,侗族的养老习俗与养老模式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参考和启示:

第一,要关注老人的精神生活,为老人提供社会交往活动和为社会服务的平台。从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情况和大多数老人的生活情况来看,养老已经是很自然的事情,整个社会和家庭内部晚辈的关照使老人能进入修养自足的状态,但养老的质量却未必保证。中国传统所谓的尊老,也主要把“孝顺”放在首位,以保证老人衣食无忧,对老人的精神生活和个人价值的发挥则是相对忽略的。即以老有所养为目标,对老有所乐、老有所为二者不太关注。今后家庭和社会都应对此加以重视。

第二,居家社区养老模式是目前我们农村可以推广的方式。据研究调查,70%以上的老人都不愿意集中到养老院去养老。虽然西方经济发达国家能够提供足够好的养老机构和设施,但是大多数老人仍然选择家庭养老模式。这都说明,传统的家庭养老与养老院集中养老相比,有着不可替代的优势,比如在精神方面和日常生活习惯方面,家庭能给予老人更多的精神抚慰和生活照顾。在目前社会养老机构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家庭结合社区养老模式,是更为合理可行的。当前,有些城市正在探索老年社区的建设,由政府和社会合作共同发展老年社区服务,兴建社区老人服务设施。研究者发现,社区养老具有节省人力、物力的优点,而且离老年人的生活近,使老年人不脱离原来的生活环境就可以得到社会服务,并保持与家人和邻里的经常联系,不至于产生心理孤独感,有利于老年人的精神生活。因此,发展社区服务也是巩固家庭养老的一项有效措施(姜向群,

1997)。发展社区老人照顾事业,还可以充分发挥社区成员的自助互助精神,鼓励和促进老年人积极参与社会发展和各项公益活动,进而增强社区的社会福利保障功能,并反过来使老年人成为最先受益者;另一方面,老年人通过参与社会活动发挥余热,产生自我价值感和尊严感,有利于老人的身心健康。有人提出“集中型”居家养老模式(宋言奇,2012),也是从其具有社区资源共享,低成本运作等优点出发的。综合看来,居家社区养老形式满足和适应了农村社会的乡情、村情、亲情的需要,也更符合中国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特别是农村地区的社会经济现实。因此,侗族的养老模式有一定的可借鉴性。

第三,在保护传统延续文化的时代背景下,通过媒体和教育机构等各种方式,宣传民族优良美德。已经有人注意到养老需发挥中华民族的养老传统,继承尊老敬老美德,保护并强化传统文化中尊老养老的优良传统及做法,这样才能营造整个社会的良好风气,在家庭与社会共同努力下,给老人一个幸福的晚年。

当然,侗寨养老模式也有其局限性。与尊老养老传统风尚相并存的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熟人社会”(费孝通,1985),即以宗族和地缘关系为中心的小社会,人们可以依赖彼此默认的非正式规范来限定和维持社会关系,宗族之首和老者往往得到更高的地位和权威,并能获得更多的社区福利。在今天的农村大部分地区虽然人口流动性大大加强,但宗族血缘关系尚存,地缘关系仍未完全破坏,在政府的扶助和鼓励下,营造社区共同的养老氛围和养老设施,制定一定的法规制度来限定和维持社会关系,并结合文化保护和公共文化建设,定期举办相关的活动,根据老年人爱好、兴趣的需要,建立一些相关的老年人休闲活动、娱乐的场所,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能对当前的养老现状有所助益。

总之,养老问题关涉老人的经济能力、家庭生活、社会参与、休闲娱乐、心理情感、体面生活、社会地位、自尊和他人的尊重等诸多方面。因此,仅仅是把部分老人集中到养老院进行照顾和管理只能满足某些人的需要,对于在大部分时间里可以生活自理的大多数老人,尤其是农村老人来说不切实际,而借鉴侗族的养老模式,培育社会的敬老风俗,也许是可推广的路径。☐

[参 考 文 献]

[美]马斯洛,著,许金声,程朝翔,译.1987.动机与人格[M].北京:华夏出版社.
《人口研究》编辑部.1998.对老年人价值的认识[J].人口研究,(5).
费孝通.1985.乡土中国[M].北京:三联书店.

冯雪峰. 2006. 文化建设再造农民福利[J]. 瞭望, (3).
 国家统计局湘潭调查队课题组. 2012. 湖南城镇居民养老需求状况的调查与思考[J]. 调研天地, (3).
 胡倍. 2010. 少数民族地区农村老年人养老生活状况研究——对甘南州麻当乡农村老年人的调查[J]. 学理论, (31).
 刘柯. 1989. 贵州少数民族风情[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姜向群. 1997. 家庭养老在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及其面临的挑战[J]. 人口学刊, (2).
 欧潮泉, 姜大谦. 2002. 侗族文化辞典[M]. 北京: 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
 宋言奇. 2012. “集中型”居家养老适应未来养老需求[N]. 中国社会科学报, 08—31.
 杨通山, 蒙光朝, 过伟. 1983. 侗乡风情录[M].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张爱华. 2010. 加强农村老年人协会建设, 促进农村社会稳定——以湖南通道县阳烂村老年人协会为例[J]. 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7).
 邹芸筠. 2012. 侗族养老制度与老年人保护法[J]. 安顺学院学报, (3).

收稿日期 2013—10—10

[责任编辑 胡宝华]

[责任校对 韦琼瑜]

[作者简介] 徐赣丽(1967~), 女, 江西宜丰人, 博士, 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人类学、民俗学。上海, 邮编: 200241。E-mail: xuganli@163.com.

首届“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人类学新锐论坛”成功举行

2013年10月10日,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人类学研究所师生迎来了复旦大学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的人类学同行。两个单位共同主办的首届“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人类学新锐论坛”在南京大学河仁楼会议厅顺利召开。

论坛由南京大学范可教授主持, 出席的嘉宾有南京大学邵京教授、杨德睿副教授、杨渝东讲师, 复旦大学潘天舒教授、纳日碧力戈教授。正在南京大学人类学研究所访学的国际知名人类学家, 波士顿大学的魏乐博(Robert Weller)教授也出席了论坛。论坛报告人及题目: 何潇(复旦大学人类学硕士, 德国马普学会人类学博士生), “上海创业梦: 金钱、时间与城市移民”; 何煦(复旦大学社会学博士生), “村落: 还是共同体吗? ——关于乡村组织生活的田野研究”; 李钰涵(复旦大学人类学硕士生), “‘老字号’企业的复兴——对‘谢馥春’化妆品的商业人类学研究”。来自南京大学和复旦大学的人类学专业研究生二十余人参与了旁听。

何潇同学在报告中阐述了其博士论文研究计划: 研究对象为从安徽到上海流动的农民工, 通过访谈和观察, 了解其生活的不确定性, 对未来的期待及实现期待的多元途径, 以观察不同的行动者如何适应市场、开辟新的经济组织和模式, 及其历时性变化。进而探讨移民流动与经济改革的关系, 并反思人类学研究经济的方法。

何煦同学的报告源于其博士论文研究。意在基于“共同体主义”理论, 考察当代中国乡村的性质。通过2008~2011年在浙江瑞安市赵宅村收集的田野资料, 展现赵宅村在团结、互动关系和自主性三个维度的村落生活, 发现其是建立在亲缘、宗教和邻里相交织的关系网络中的, 村民认为村落作为整体占有和支配土地, 这种观念和行动在村落生活中产生了共同体的体验。但在国家推行的城市化过程中, 原有的共同体关系受到挑战, 村民们越来越主张其作为村落成员对土地的完全自主权, 而国家对于这种权利的否认, 造成国家与村民间的重要矛盾。

李钰涵同学在报告中阐述了其硕士论文研究计划: 以扬州老字号化妆品品牌“谢馥春”为考察对象, 运用商业人类学的视角和方法, 旨在解读“谢馥春”在当代社会如何成功从濒危走向复兴。并重新审视作为传统文化现象的老字号在现代市场中的重要价值, 给未来发展以启示。以期进一步探讨老字号企业如何抵挡跨国公司的冲击, 全球化与地方化如何在具体实践中互动。

报告完成后, 嘉宾进行了点评。邵京教授就集体所有制、杨德睿副教授就宗教与宗族的关系、范可教授就共同体的概念、Robert Weller教授就田野与理论基础的结合, 给予报告人中肯意见, 引发老师同学间热烈讨论。

此次“南京大学—复旦大学人类学新锐论坛”, 为推动长江三角洲地区人类学学术共同体的形成走出了第一步, 同时也在教学上做了有益的探索。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社会人类学研究所 硕士生宋寒昱 供稿)